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5.4

一年出版4期，以16種語言刊出

「破」的力量

Frances Fox Piven

伊斯蘭國的致命吸引力

François Burgat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過去

Jan Breman

奧地利公共社會學

Rudolf Richter

轉型的古巴

- > 美國和古巴
- > 種族主義和革命
- > Havana的新聞頭條

台灣社會學

- > 太陽花運動
- > 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
- > 壓縮的親職
- > 崩壞的形成
- > 台灣社會學的發展
- > 巷子口社會學

紀念

- > Jürgen Hartmann, 1944-2015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5卷 / 第4期 / 2015.12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跨學科性和學科

我們這期《全球對話》以兩篇訪談作為開始。第一篇是Frances Fox Piven的訪談。她是美國社會學歷史上一位很重要的學者，其對於福利權利、投票註冊、以及最近的佔領運動有著原創性的分析，並且著重在反抗的權力上面。她無懼和Milton Friedman等人辯論，還因此遭到右派人士的群起圍攻。第二篇訪談則是訪問了法國中東研究專家François Burgat。在這篇訪談中，Burgat解釋了伊斯蘭國對於歐洲年輕穆斯林的號召力如何和在歐洲的種族主義排擠有關。接下來則是Jan Breman的文章。Breman是荷蘭研究非正式經濟活動的社會學家，這篇文章中則分析了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間的複雜關係。以上這三位學者都是社會學出身，但是其對於公共議題的分析融合了政治學、人類學、歷史、社會學，顯示了學科邊界的區分是如何的次要。

接下來關於古巴的幾篇文章也揭示了這個重點。Luis Rumbaut和Rubén Rumbaut分析了古巴和美國之間的複雜歷史，強調了累積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壓力如何使兩國走向了復交的道路。而Luisa Steur則討論了底層低薪清潔工怎麼詮釋和理解這個政治事件。她比較了蘇聯的市場經濟轉型如何和古巴的轉型相似，並且兩者惡化了社會的不平等。Luisa Steur也訪談了非裔古巴運動人士Norberto Carbonell。Carbonell很效忠古巴共產黨，但是也相當批判古巴的種族主義。然而我也想指出的另外一個重點是：這種訪談大概一年前是不可能刊出來的。

跨學科性的形成需要諸多學科的相互激盪。社會學在國家的邊界內發展還是會受到全球各領域的影響，而這也是接下來6篇關於台灣的文章所要傳達的重點之一。台灣是個小島，位於美國和中國的夾縫中，有著激進的社會運動歷史，也孕育出了亞洲其中之一最有活力的社會學。由於這個國家對於地緣政治的敏感和被殖民的歷史經驗，使得其開創出了獨特的全球社會學取徑。此外，這幾篇文章的作者多數都親身參與了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運動，所以也發展出了對於社會運動的獨到見解。就像在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最近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把社會學的批判面向帶到了全國政治舞台的中央，走入公眾，超越了學術的邊界。

公共社會學也是Rudolf Richter文章的主題。該文章描述了奧地利社會學的歷史，也是我們一系列介紹ISA論壇的第一篇文章。論壇將在明年7月10-14日於Vienna舉行。在地的籌備委員會也已經起跑了，請上論壇的部落格一探究竟：<http://isaforum2016.univie.ac.at/blog/>。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forum2016.univie.ac.at/)。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Frances Fox Piven 是美國社會學家。本期由 Lorraine Minnite 訪談她，討論其社會運動理論。



François Burgat 是研究中東社會的學者。本期由 Sari Hanafi 訪問，並討論伊斯蘭國的對年輕人的號召力。



Jan Breman 是著名的荷蘭社會學家。本期討論社會學和人類學之間奇怪的區隔。



Rudolf Richter是ISA的2015年論壇的在地籌委會主席。其討論奧地利公共社會學的遺產。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Pragya Sharma,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wani,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ohsen Rajab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Fuma Sekiguchi, Shinsa Kameo, Kanako Matake, Kaho Miyahara, Yuki Nakano, Yutaro Shimokawa, Sakiye Yoshioka.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Daurenbek Kuleime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Mariusz Finkielsztein, Weronika Gawarska,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Martyna Maciuch,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Corina Brăgaru, Costinel Anuţa, Telegdy Balasz, Adriana Bondor, Roxana Bratu, Ramona Cantaragiu, Alexandra Ciocănel, Alexandru Duţu, Ruxandra Iordache, Mihai-Bogdan Marian, Ramona Marinache, Anca Mihai, Radu Năforniţă, Oana-Elena Negrea, Diana Tihan,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Carmen Voinea.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Lubov Chernyshova, Anastasija Golovne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跨學科性和學科 2

「破」的力量：訪問 Frances Fox Piven
by Lorraine C. Minnite, 美國 4

伊斯蘭國的致命吸引力：訪問 François Burgat
by Sari Hanafi, 黎巴嫩 7

社會學和人類學鮮為人知的過去
by Jan Breman, 荷蘭 10

奧地利公共社會學的遺產
by Rudolf Richter, 奧地利 13

> 轉型的古巴

美國和古巴：和解是件困難的事情
by Luis E. Rumbaut, Rubén G. Rumbaut, 美國 15

種族主義和革命：訪談 Norberto Mesa Carbonell
by Luisa Steur, 丹麥 18

Havana 的新聞頭條
by Luisa Steur, 丹麥 21

> 台灣社會學

太陽花運動和接受重重挑戰的台灣社會學
by 何明修, 台灣 23

誰先出頭？工運還是環境運動？
by 劉華真, 台灣 25

壓縮的親職
by 藍佩嘉, 台灣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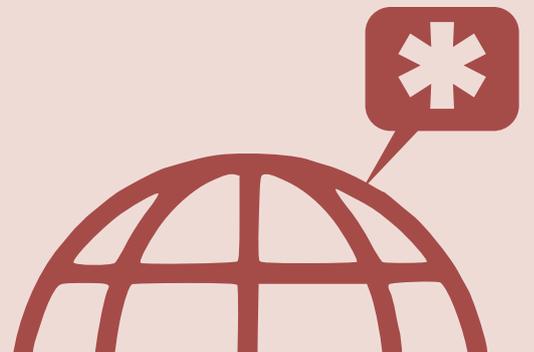
崩壞的形成：21世紀的台灣
by 林宗弘, 台灣 30

台灣社會學發展過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by 張茂桂, 台灣 32

巷子口社會學
by 王宏仁, 台灣 34

> 紀念

Jürgen Hartmann：致力獻身的國際主義者
by Lyudmila Nurse, 英國, Sylvia Trnka, 奧地利 36



> 「破」的力量

訪問 Frances Fox Piven

Frances Fox Piven 是世界知名的社會科學家，也是相當受到學生愛戴的老師。她是一位激進的民主人士，也是啟發了許多人的學者和運動者，其為窮人的辯護可說是其生涯的核心關懷。她的第一本書：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Welfare (1971) 是和 Richard A. Cloward 一起撰寫，並引起了一場學術辯論，而且重塑了社會福利政策的領域。其接下來的著作也分析了窮人的「破」的行動 (disruptive action) 之處境如何影響了當代美國福利國家的基礎 (Poor People's Movements, 1977) 以及對於進步的社會政策進展和政治改格式如何必要 (The Breaking of the American Social Compact, 1997; Challenging Authority, 2006)。Piven 總是將學術研究和政治介入結合在一起，並且發起福利權利的運動，投票註冊運動，以及公開支持 Occupy 運動。她並且在媒體上奮力的為其論述辯護，與自由派的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 為敵，和其公開辯論，她得到了許多的殊榮和獎項，包括了 2007 年擔任美國社會學會的會長。在接下來的訪談中，她將會闡釋其「相互依賴的力量」的理論，這是她的核心論述。Lorraine C. Minnite 則是美國 Rutgers 大學的政治學家和政策學家，她在 2015 年的 5 月 30 日於 New York 的 Millerton 訪談 Piven。



LM：我想問有關「破」(disruption) 的問題。這是你的研究中不斷出現的主題，特別是你第一個發表的文章〈Low Income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和你著名的於 1966 年在《The Nation》和 Richard Cloward 合寫的文章〈The Weight of the Poor〉。我們今天常聽到「破」，像是高科技公司很崇拜「破」這個概念，去破其他產業，因為有趣又可獲利。而社會運動學者也用了越來越多這個詞。因為這已經是一個你長期以來核心概念了，你可以說說看在社會理論中，這個概念意味著什麼？

FP：雖然這個概念常常被用，但是我認為其用法不夠謹慎。在科技業中，「破」是指一個創新但混亂的市場；社會運動研究者則是說一個集體行動是喧鬧的、無序的、甚至可能暴力的。但是雜音和失序卻不能解釋為什麼破有時可以帶給底層民眾某種力量。

你提到了我早期的著作，那時的寫作脈

| Frances Fox Piven.

>>

絡是窮苦的黑人抗議才剛爆發 (New York 和波多黎各移民)。那些抗議當然是吵雜和失序的。這是為什麼呢？我問。因為在 1960 年代早期，有許多人遷徙到城市裡面，他們是是從南方鄉下和波多黎各來的。這些人毫無疑問的是來追求更好生活的。而當然他們也都窮，然後也發現都市並不能給他們好的工作去追求好的生活，而且政府也不給予他們支持。所以人們就開始聚集在一起，上街頭抗議、呼喊，並且把垃圾丟到市政府的草地上。於是自由派的白人和多數是社會政策專家會說：「我贊成你們的目標，可是我不贊成你們的手段。是啊，你應該有工作，你應該有收入，你應該有健保，你的房子應該要有暖氣和熱水。可是呢，製造噪音、找麻煩等等，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喔。你要做的是聯合起來，投票、請願。」所以總之你就是要按照這些民主的規則來走。

我則是對這種看法保持懷疑的態度。我認為人們之所作那些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是因為那些自由派給了很爛的建議。事實上，他們許多人的確嘗試過一般的民主程序，也在市政府有些許影響力，他們也申請了社會福利等其他服務，可是到頭來發現的是那些申請案件都被忽略了。

我的結論是，當人們使用「破」的策略時，是因為這些「破」的方式是有用的。這也是我對於為什麼窮人使用破的運動手段所做出的解釋。事實上，許多時候人們是沉默的，但是當在政治場域的時候，事情就會變得沒那麼井然有序。

我和 Richard Cloward 一起發展出了我認為是更有分析性也更有意義的對於「破」的解釋。若要真正理解我論證的，可能要退一步先看看人們的行動，然後問：那些窮人在那些組成社會的複雜社會關係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或是說，在社會分工下，他們的角色為何？

LM：涂爾幹式的概念？

FP：是的，涂爾幹在這點當然很有影響。

而當人們拒絕自己的角色然後開始採用破的手段去行動時，結果會怎麼樣？或許破並不只是出於需要，而更是一種權力的來源。

所以，我的論點是：若要說窮人總是被排斥的，這不太對。他們其實是被融入社會的，只不過這個社會之所以接受他們，目的是為了去剝削他們。窮人的角色很重要，家

庭幫傭、褓母、照顧者，或是工友，速食店員工，清潔工等等。過去幾十年來，這些工作已經變成越來越不安全，變成臨時約聘的契約模式，而且薪資也下降。

但是這些工人沒有權力嗎？想想在全球化城市 New York、London、San Francisco、Boston 等等的家務幫傭，他們照顧小孩、打掃房子、煮飯等等，幫那些專業階層的女人做這些事情。若是這些人不幹了，那勢必大大影響了那些律師、會計、經理等支撐著這個金融化的經濟體系的人。

換句話說，家庭幫傭是有權力的，因為若他們不工作，那麼那些專業階級的人也就沒辦法去工作。

LM：在「Poor People's Movements」一書中裡，你和 Richard Cloward 說到社會福利體系的建造過程和社會改革中集體抗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你怎麼評價現在的情況？怎麼用你「破」的理論去看？

FP：人們多數時候認為代議民主可以幫他們實現願望。但是我不認為代議民主對於底層人民來說是有用的。我越來越認為其甚至對多數人來說並沒有用，因為腐敗很厲害。而歐洲也因為跨國家的組織凌駕了國家民主制度，也不太有用。可是，代議民主制度是不能沒有的。重要的是在這個制度上我們怎麼去回應成功與失敗。

的確，代議民主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其開啟了相對平等的場域，而人民在這個場域中是可以投票改變政府決策的。換句話說，統治精英是會下台的。選舉民主也保障了結社的權利，所以讓那些個體的公民可以集結發聲。

而也有許多不同形式的代議民主。可是基本上這的制度的設計是開啟社會生活的場域，讓每一個人有資源，而且上層階級會依賴這些資源，然後這些資源多少是可以平均分配的。

可是這裡有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這個平等的場域並沒有和社會其他很不平等的領域分開。而那些不平等會影響到這個民主的場域。在美國，這個情況特別糟，因為最高法院的「Citizens United 決議」推翻了美國幾十年來限制選舉操作工程的法律，而現在則是上億美金可以投入選戰當中。此外，這是個代議體制，選票的目的是要變成人民的意見，但是這個機制也被扭曲了，部份是

>>

因為美國的憲法。可是以前沒像現在那麼極端，現在遊說團體可以進入立法程序，直接收買政治人物。

可是，我的重點是另外一個。注意，代議民主的核心是在於政治精英和投票人民之間相互依賴上面。

所以典型的一個例子是當運動發生的時候，有須多人會開始要運動者不要太過惹事生非，而應該去試著讓改革的政治人物選上，而同時運動者也都會批判政治。沒有任何一方會喜歡這樣的選舉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扭曲了真實世界的形式。和運動有所互動，而且有時會引發破的效應，這就是運動權力的來源。

因為政黨和候選人試著要贏得多數選票，所以他們要去打壓那些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或是那些會嚇跑他們金主的議題。政治人物若需要那些運動的選票，那麼他們會轉移焦點，會說「我當然支持種族融合，但是這要慢慢來。」而「慢慢來」通常就是意味著「不可能發生」。若政治人物要轉移運動的焦點，那麼很可能是這些運動所訴求的東西是真的會在政治場域中產生影響的。若是這時運動可以趁勢發展，像是民權運動從民主黨的政綱中得到回應一樣，運動就會蓬勃發展下去。

當運動發展起來之後，會對於候選人有威脅性，因為他們需要選票也需要錢。運動成功的時候就是政治人物讓步的時候。

LM：妳的破的理論和相互依賴權力的理論用來解釋運動如何可以成功，這是從美國歷史和妳的經驗中發展而來的，特別是妳在1960年代 New York City 的福利權利運動。你覺得這個理論適用在其他國家嗎？

FP：我想某些部份是適用的，雖然美國的兩黨制度可能對於運動特別沒轍，但是希臘的抗議也幫助了 PASOK 的分裂，讓 Syriza 這個極左派可以成功。

LM：現在的運動選舉動態怎麼解釋 Barack Obama 的選舉？而對於社會改革的前進來說，限制又是什麼？

FP: Obama 的選票支持主要來自於年輕人和弱勢族群。他在經濟最慘的時候入主白宮，但是那時運動還沒有真正擴大。

我想 Obama 的總統任期可以和 Herbert Hoover 做個比較。後者是共和黨總統，在

1929 年於股票市場崩潰時和大蕭條開始的時候執政。甚至也有些人要比較 Obama 和 Hoover 的繼任者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也就是新政的掌舵者。在 1930-31 時候也有抗議，但是規模比較小。那時人們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評估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要採取什麼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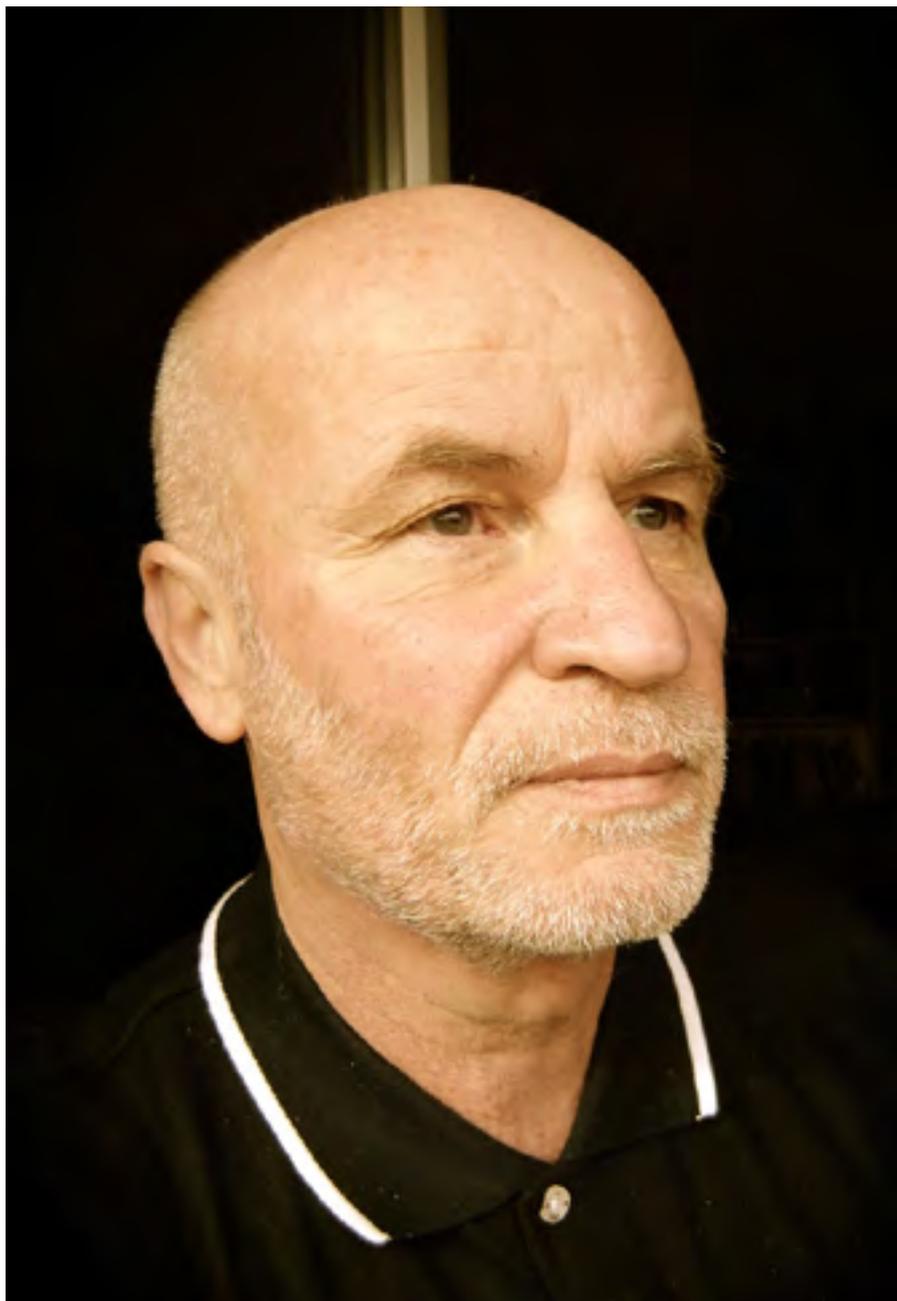
大型的抗議後來開始了，也就是在大蕭條之後的幾年，那也是 Hoover 一直想要安撫民眾後的幾年。

2008 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年輕的運動者興起了（像是 Move-on 幫忙打選戰），可是那不是抗議。學生和勞工運動在 Wisconsin 展開，然後是 Occupy 運動，還有 Fight for Fifteen, Hands Up, Don't Shoot 等等，這些都花了些時間才展開。當然若這些運動是在 2008 年發生，我想 Obama 或許會是更好的總統。2015 年的現在，這些運動正在發展起來，包括了抗議低薪資的運動和抗議警察歧視的運動等等。我想美國應該要期待這些運動發展下去，部份也是因為下一任 Clinton 總統任期不會忽視這些運動才是。

來信寄給 Frances Fox Piven <fpiven@hotmail.com>
和 Lorraine Minnite <lminnite@gmail.com>

> 伊斯蘭國的致命吸引力

訪問 François Burgat



François Burgat 是政治社會學家，也是法國科學研究中心 (CNRS) 的研究員。他致力於研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系統和公民社會的研究。他也是少數了解伊斯蘭國的學者，既不會浪漫化也不會醜化斯蘭國，勇敢地 and 主流論述抗衡。他現在則是歐洲研究中心計畫「當阿拉伯世界的威權主義失敗時」的計畫主持人。最近出版了 *Pas de printemps pour la Syrie : Les clés pour comprendre les acteurs et les défis de la crise, 2011-2013* 一書 (敘利亞沒有春天：了解敘利亞危機的行動者和挑戰，2011-2013)。Sari Hanafi 訪問了 Burgat。Hanafi 於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任教，也是 ISA 國家學會副會長。

François Burgat.

從2014年9月開始，儘管國際的轟炸沒有停過，伊斯蘭國(IS)的「持續和擴張」很不幸地道中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現實情況。然而這個擴張並不意味著權力的鞏固。而伊斯蘭國想要建立的「遜尼領土」不僅僅在地理區域的意義上，還包括了人口的意義上，仍然不穩定。在2014年尾聲，CIA估計有20000到31500名IS戰士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作戰。但是其他的單位則估計有200000。這樣的擴張必須連結到該地區失敗的國家統治和意識形態分歧。毫無疑問的是，IS的組織在不同的國家運作，所以變成了全球化的組織，有6000名歐洲公民加入，而其中有1500名是法國的公民，他們加入了反抗敘利亞政府的戰役。這些人需多有穆斯林的背景，但是有些是改宗信伊斯蘭教的。下面的訪談，François Burgat解釋了為什麼歐洲人會加入IS。

SH：IS為該地區帶來了新的政治想像：解除邊界、帝國建立等等，你認為這些事物吸引了年輕人嗎？

FB：是的，當然。雖然IS的號召力有很多來源，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出幾個共同特點。為了清楚說明年輕人加入IS的動機，我建議使用兩個類別：「反向」動機和「正向」動機。反向指的是年輕人拒絕了其原本國家的文化氛圍，正向指的是IS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在解釋反向和正向動機之前，我想首先討論其他解釋IS號召力的論述：圍繞在「意識形態」或「宗教」的解釋，把所有的結果都歸因給「激進伊斯蘭」，認為年輕人因為閱讀Sayyid Qutb或是接觸了它，或是遇到了「激進」的伊瑪尼，或是網路，所以被「污染」了。

在我看來，伊斯蘭的語彙可以加速激進化的進程，但是不能解釋個人層次的轉變。激進化的世界史告訴了我們：激進反抗者的語言不能和其激進反叛的源頭有所混淆。不論地區或是教義，那些準備反抗的人都會找到象徵性的、宗教的、褻瀆的資源，進而合理化其行動。「伊斯蘭意識形態」式的對於暴力的詮釋在西方很受到歡迎，那是因為指出罪行在伊斯蘭信仰中可以允許觀察者（非穆斯林）去拒絕任何的責任。在這些論述的背後通常有一種「教育的幻覺」，就是說那些論述通常聲稱聖戰士沒有讀「正確的經文」，或是讀得不夠徹底，或是不了解他們

所讀的經文內容等等，這些都隱含著在阿拉伯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伊斯蘭激進主義可以透過宗教教育來加以平衡。我想我不應該不用去解釋這種論證的限制，因為很缺點很明顯了。

SH：讓我們回到一開始你所提出的「反向動機」的討論上面。

FB：反向動機說的是那些戰士被「全球排斥」的主觀感受，以及在其原生社會這種感受如何被激發出來。這些聖戰士之中，有少數人在成年的過程中面臨到了社會或經濟的失敗與困難，這些人通常是那些在歐洲的北非裔或是「伊斯蘭裔」的人口。

簡單說，許多法國聖戰士因為個人或群體的污名化而到敘利亞，做為一種政治的回應。這些污名化包括了：不平等教育、工作機會、警察的歧視、法律的歧視等等。然而，我們很少談到的則是這些不平等通常由於缺少政治代表而產生，這可以在兩個層次上看到。政治代表性的缺乏是從統計數據上可以清楚看到的事實，但是還包括其他系統性的限制，像是言論自由，這尤其在主流媒體上可以發現。此外，這些偏見更由於媒體偏好「官方」和不具代表伊斯蘭的「人物」，而更加惡化。

這兩個層次的政治宰制起源於殖民時代。第一，被統治者是噤聲的，而且他們有了透過誤識(misrecognition)而得到的國家歸屬感的幻覺，接受殖民宰制。20年前，也就是1995年，阿爾及利亞的內暫時，我訪問了年輕的穆斯林，說到了在歧視之下體驗的「共存」的痛苦：「當法國電視談論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伊斯蘭時，我們都想要轉台！你相信嗎？我那時轉台轉到手指都會痛！真的！」那些電視節目對於移民和其祖先的鄙視還會用更粗鄙直接的方式表出來，像是吐口水或是其他對於那些戴頭巾的女性。

SH：你可以多談一點IS的「正向」動機嗎？

FB：是的，要那些被世界所遺棄的人去和這個世界做個切割，這種需要必須要伴隨一些正向的動機。即使對那些已經很好整合到社會的穆斯林來說，不論是經濟或是社會的面向，某些動機會增加，或是取代反向的動機，然後到敘利亞去參戰，或是加入國際的戰役。歷史上來說，聖戰行動是從跨國的

>>

意識形態或是宗派的團結感而來。眾多理由之中，許多人是說要去幫助那些宗教上的弟兄，因為他們被西方所遺棄，而且被敘利亞的 Assad 政府所屠殺。這些理由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從歐洲的歷史來說，這些跨國或是國與國之間的連帶並不特別。想想 1936 年的西班牙共支持「國際軍旅」的形成，包括了許多知名的法國人。或是看看法國人 Régis Debray（前總統 François Mitterand 的特別顧問）加入了玻利維亞游擊隊戰役的經驗。我們也聽說過有數百法國基督教徒和佛朗哥主義者在黎巴嫩內戰中並肩作戰。我們或許也可以看一下加入以色列軍隊的法國人。

然而在表達了人道主義式的團結之後，我想，IS 透過了傳達一種烏托邦、自由的「遜尼國度」的想像，類似於 Khomeini 的伊朗所要給什葉派的一樣，那是一個（至少 IS 是這樣認為）可以給穆斯林有機會按照自己宗教信仰去生活的理想地方。此外，這也是一個可以用暴力來對付恐伊斯蘭的行為的地方，甚至可以以牙還牙，對抗軍隊或象徵的暴力，不論是炸彈或是漫畫。

官方的論述都忽略了這個更廣的脈絡。

1 月 7 日的 Paris 攻擊事件，官方的解釋都過度狹隘地聚焦在那些被所謂「恐怖分子」持 AK-47 射殺的受害者身上。政府和媒體都忽略了那些被以色列 F-16、法國疾風戰機、或是美國無人機所殺死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更廣大的時空視野去看這些衝突。若我們了解反向動機會導向激進主義，那麼我們就必須把這些動態放到國際和歷史的脈絡下來看待。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看到政治上的分裂是要追溯到殖民時代的。最近，這個裂痕又被重新撕開，因為法國的單邊主義政策，直接或透國盟國，像是以色列或是美國，在馬利、伊拉克、加薩走廊、葉門等國實施。

若沒有這些早期的衝突，Paris 的事件也不會發生。而以上這些觀點卻都是在那些專注在各種變數的「分析」之中所缺乏的。讓我做個結論：在 911 攻擊之後，社會學有幫助我們對類似事件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嗎？我想，幾乎沒有。■

來信寄給 François Burgat <francoisburgat73@gmail.com>

和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 社會學和人類學

鮮為人知的過去

by Jan Brema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荷蘭



Dr. J.V. de Bruyn是荷屬新幾內亞的官方人類學家。圖片來自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Leiden, 荷蘭

在20世紀初期，荷蘭的社會科學創立者在社會學和人類學之間劃下了清楚的界線。人類學研究的是「較不先進」的人群，而社會學研究的是「比較先進」的社會——也就是西方社會。這個區分當然是太過於簡化了。

從17世紀開始，荷蘭就開始建立了自己的帝國版圖。統治海外的領土需要知道當地人口文化與社會結構。大規模的、階層的、有識字能力的社會像是東印度群島，他

>>

們稱為本地人 (native)，而非原住民 (aboriginals)。原住民這個詞保留給規模較小的、較遠的、沒有政府的部落。而殖民一開始的用意是為了讓殖民母國可以從中得利，或許剩餘價值。而這的意義必須被改變。殖民因此被描述成是文明化的任務。

在 20 世紀的一開始，外國的統治被認為是一種保護，是幫助殖民地去發展進步。這種發展主義的論述 (mise en valeur) 認為要帶給那些地方所缺乏的進步價值。所以，荷蘭的殖民社會學家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英國政府在非洲的人類學家一樣，給當地政府政策建議，或是研究怎麼讓伊斯蘭運動的熱情可以冷卻下來，或是去找出社會動亂背後的指使者，或是幫殖民政策制定者知道如何讓爪哇農民可以內化資本主義的精神。而這樣的文明化任務宣稱「那些當地人的先在狀況就是我們的過去，而我們就是他們的未來。」為了要實現這樣的文明轉變，被殖民者必須要與過去的認同切割，成為沒有歷史的民族。

而當 20 世紀中葉殖民地解放之後，白人所謂的歷史任務有卸下來了嗎？荷蘭的政治人物認為那些從殖民地收集而來的知識和資訊不能浪費，所以成立了幾間新的大學，像是 Leiden 和 Amsterdam 等，開設了像是「非西方」的社會學系所，研究前殖民地的社會。「非西方」這是個奇怪的標籤，因為他等於是說這些社會不是但可能透過一些轉型而改變。「非西方」社會學作為一個領域，因此介於人類學 (研究巴布亞紐幾內亞或是蘇里南等第) 和社會學 (西方社會) 之間。這是一種狹隘的地域主義，拒絕了像是韋伯、圖尼斯、涂爾幹等人所提出的普世研究方案。

這個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讓社會學者對於他們口中所謂的第三世界視而不見，而只把自己的研究限縮在「當代」的全球北方社會。後殖民時期的文明化任務還是持續著，並且正式的宣稱要幫助「落後」的國家迎頭趕上那先「先進」國家。奇怪的「非西方」說法把許多不同的人群和文化都放在同一



在1906第一次對於新幾內亞的探索，一位荷蘭人想要和巴布亞的女性握手，而該女性很疑惑。圖片來自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Leiden, 荷蘭

個標籤下面，而現在則變成了一種很吸引人的論述，聲稱要去幫助全球南方的國家發展，因此有了所謂的發展社會學，要讓世界其他地方（全球人口的多數所在）可以從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

而人類學這個學科已經有所轉變了。「我們仍活著的祖先」的說法已經沒有了。若在澳洲、亞洲、非洲美洲等地方還沒有完全根除，那麼也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整合進去，失去了自主性。可是人類學和社會學有著不同的方法，其繼續可以找到地方去進行「田野研究」，接近研究對象，然後成越來越熟悉該地方。

但社會學如何不同於人類學呢？在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的人類學的教授認為人類學應該研究傳統，而社會學研究現代性（我在 1950 年代進入該大學的亞洲研究）。這個區分並沒有延續下來，因為這其實很難真正區分開來。其實，主要的問題還是社會為什麼、如何改變，以及改變的結果是什麼。兩者都是在探討過去和現在，並不是在實體化傳統和現代的區分。

當我在 1987 年成為比較社會學的教授之後，我並不希望使用「非西方」或是「發展」研究的稱呼，所以我和一位資深的同事成立了 Amsterdam 社會研究學院 (ASSR)，有博士班，目的是把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史等學等整合，研究全球化的歷史。雖然我們在學術上很成功，但是卻沒有辦法說服國家的贊助機構或是大學的理事會提供足夠

的資金。在缺少支持的情況下，ASSR 轉型成 Amsterdam 社會科學院。成員一分為二：社會學和人類學，各自有各自的研究領域。

而這兩著又分家了嗎？總的來說，是的，因為他們的區別在於「西方」和「其他地方」，這其實就是所謂的「先進」和「落後」的另外一種說法而已。然而，再度分家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為現在的社會和地緣政治要區分先進和落後其實很沒什麼意思。所謂的發展和解釋落後國家如何變得先進，這種說法已經被揚棄了。其他地方其實在很多面向並沒有遵照西方的發展模式，而且誰知道接下來說不定歷史是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呢？■

來信寄給 Jan Breman <I.C.Breman@uva.nl>

> 奧地利 公共社會學的傳承

by Rudolf Richter, University of Vienna, 奧地利, 第三屆ISA社會學論壇在地籌委會主席, Vienna, 2016



位於Marienthal的成衣廠，1914年。奧地利社會學的歷史檔案館，University of Graz。

第三屆的ISA論壇主題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全球社會學和追求更好的未來」。這個主題是由論壇主席Markus Schulz所定出來的。而論壇的地點也很適合這個主題：奧地利。奧地利社會學長期以來就試著結合科學影響和社會信念。

在1930年代，因為喧囂的1920年代將一次大戰的痛給包紮了起來，大蕭條重創了奧地利的社會。統計學家Hans Zeisel, Marie Jahoda, 和Paul Lazarsfeld進行了著名的「Marienthal研究」，其檢視了Marienthal村莊由於工廠倒地而來的失業潮所帶來的影響。在德文版的導言裡面，Marie Jahoda解釋

了研究著的旨趣：第一，該研究目的之一是要為了幫助解決Marienthal的失業問題；第二，該研究是要提供一個客觀的社會分析。這些目的至今仍然導引著奧地利社會學：系統性的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

在後來的版本中，Paul Lazarsfeld註明說道，研究者也已經試著去使用新的方法研究Marienthal的失業現象。他們測量村民走路的速度，然後發給他們時間表，詢問學生的願望並請他們寫下，並使用圖書館的借書的統計資料，然後還有家庭的用餐紀錄。

在我們論壇的主題的脈絡下，我覺得值得一題的

是，Marienthal的研究者並沒有對未來有任何的價值判斷，也沒有發明另一個未來。但是該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典範說明何謂「追求一個更好的世界」：其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社會問題的理解，該社會問題則必須被解決。這項研究顯示了失業對於個人和社群的影響，紀錄了日常生活的崩解，以及無奈的接受事實。這些社會議題的細緻描述讓政策制定者可以不犯錯。

而Vienna的科學社群也被其他的群體所形塑，也就是Vienna學派。Rudolf Carnap和其他邏輯實證論者，包括統計學家Otto Neurath，在把社會學知識傳遞給公眾的這點上有很大的

>>



Marienthal Museum 紀念 Marie Jahoda, Hans Zeisel, Paul Lazarsfeld 和 Lotte Schenk-Danzinger。奧地利社會學的歷史檔案館，University of Graz。

影響力。而這也是奧地利社會學的特色。Neurath 和藝術家 Gert Arntz 發明了圖像統計，成立了「社會和經濟博物館」(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museum)，也就是要把社會統計傳遞給公眾。該博物館至今還存在著。

然而 Vienna Circle 的邏輯實證論只有一部分整合到奧地利社會學。Karl Popper 的批判理性論則增加了另一項觀點。其著名的書：《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反對「封閉的」共產主義社會。若把該書的情緒先放到一邊，其實 Popper 的政治主張很清楚：社會必須對未來開放，並且他們都有、而且都會有歷史。任何要把社會封閉起來去建造理想社會的企圖，雖然目的是很人性的，但最終都會導向極權統治。這結果不可能是「我們想要的未來」。

而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於奧地利學術來說有著深遠的影響，對於中歐和東歐也是如此。在二次大戰之後，奧地利社會學從零開始，要到了 1960 年代第一個社會學系才在 University

of Vienna 建立。一開始，許多社會學家探討都市住房問題，青年處境、代間關係等等，並且和政府合作探討家庭和老年化社會的照護。而從 1970 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分析了遷徙的問題，給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建議。社會不平等的結構分析也是很根本的研究領域。社會學也持續受到公共的注意，報紙也時常討論之。

最近幾十年來，或許奧地利的社會學的特色就是致力於研究社會問題，系統性地應用科學方法。我期待奧地利的社會學可以深耕這個傳統，這個期待可以在 ISA 論壇的部落格看到：<http://isaforum2016.univie.ac.at/blog/>

科學知識和社會影響的整合也是這次論壇的重點：我們想要怎樣的未來？又要如何追求呢？

我想先從第二個問題開始：如何追求我們想要的未來？我個人認為社會學家應該以社會學家的角色去做這件事情：系統地、科學地、

分析地，並且抱持著 Jürgen Habermas 所說的解放的旨趣。對社會學家而言，追求更好的未來必須先追求更好的方法和理論，為的是去理解社會問題。

這點則扣合到第一個問題：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未來？雖然我們可以說出當代社會問題——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均，就簡單舉例這兩個好了，但是若要設想一個完全沒有這兩個問題的美好未來是很危險的。理想的社會總是極權專制的，特別是當一群人（包括社會學）宣稱他們知道真理的時候，更是危險。

除了追求某種版本的未來，我想社會學家或許應該像 Karl Popper 可能說過的，就是去宣稱未來是會變化的，而社會也有著連續的歷史。■

來信寄給 Rudolf Richter
<rudolf.richter@univie.ac.at>

> 美國和古巴： 和解是件很複雜的事

by Luis E. Rumbaut, Cuban American Alliance, Washington D.C., 美國； Rubén G. Rumbau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美國



古巴革命帶來了什麼影響？José Martí雕像凝視著 Che Guevara 的圖像。Plaza de la Revolución, Havana。

去年 12 月，美國總統 Obama 在一場 13 分鐘的演說中，說道過去對於古巴的經濟制裁是個失敗的政策。美國政府——至少是行政部門——已經準備好要採用新的政策，要去恢復和古巴的外交關係，並且視古巴為好鄰居和經濟夥伴。用 19 世紀古巴的民族英雄和知識分子 José Martí 的話來說，談判必須在沉默中進行，因為利益可能會傷害和平的對話，甚至在會讓還沒開始的對話提早結束。

那些利益如今突然變得狹隘和自私。反革命

的危險和美國企業的威脅比起來顯得微不足道。因為那些企業已經虎視眈眈地想要在古巴開疆闢土，特別是觀光業。這是很有可能的，農業、畜牧、輕工業、生活用品、建造業、房屋業、交通，甚至是高科技的生技產業都會有所改變。

今天，不論大小的企業都支持總統，越來越多的人在新的政策下旅遊。也有越來越多的古巴移民和觀光客把來往於 Miami 和 Havana 之間視為常態。Miami 的鷹派都如 Fidel 和 Raúl 一樣老了；新的移民沒有在古巴革命初期失去財產

>>



古巴總統Raúl Castro和美國總統Barack Obama在美洲高峰會上握手。2015年4月。

的那些人也在增加。如今，新的政策勢在必行。

可是，當新的可能即將來臨，邁向常態化的道路也充滿荊棘與阻礙。恢復外交關係只是第一步而已。

> 更新的古巴模型

許多年以前，在 Obama 的宣佈之前，古巴就已經在討論新的經濟策略。而這樣的討論產生了許多方針，包括了不使用土地的允許使用，小企業的合法化，國有企業的自主性，以及對農業和非農業組織的支持。

古巴毫無疑問地必須在增加食物和以國內農產品替代進口食品這點上面取得成功。此外，城鄉之間的交通也必須改進，冷藏保存農作物也要提昇品質；盒子和袋子的足夠，耕作機器和燃料的升級以都是必須的。

雖然那是一個預測，可是結果到目前為止是不平均的。許多因素複雜化了這個景象，包括了基礎農業進口的可得性。

古巴的企業家總是沒有效率，缺乏小企業管理的技能，這很重要，不只是因為財務健全需要這些技能，還因為稅收也需要。這是因的考量，特別是在國家角色減少，私人企業擴張之的時候。而國家部門，其仍然休眠中，特別在糖、光觀、礦產、石油、煉油、健康、生技醫療、教育、鐵路、航空產業等，必須要增加產量才行。

古巴也面對了兩個不尋常的挑戰：必須鞏固現有的貨幣（比索和可對換比索），以及人口老化。

第一個是最受到歡迎的。政府前進得很緩慢，體認到了那些使用不可兌換的比索幣的人會找到更好的可兌換貨幣，而美金的流入和外國貨物的進口，特別是從 Florida 來的，將會影響許多家庭，但這個影響會因為有沒有親人在

美國而有所差別。

古巴人口的老化並不特別，但是這帶來了新的挑戰。古巴的醫療進步意味著其人民比數十年前更長壽了，但是年輕人的出走讓事情變得更複雜了，都市化也帶來一樣的影響。年輕勞動力的下降特別讓新土地的使用計畫變得複雜許多。農業需要青年，包括那些受過農業經濟、土壤管理、市場等領域教育的人。在 2002 年和 2012 年之間古巴的人口普查顯示了人口正在減少，只是自從古巴於 19 世紀獨立以來的史上第一次。這是由於古巴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外移，而這十年也有 333,000 古巴人在美國取得擁有居留權。

當古巴的新經濟政策包括了提高農業產量、小型經濟、增進公有企業的管理，增加在 Mariel 新的港口，開放來自美國的觀光產業，以及和所有國家的貿易，這些都會有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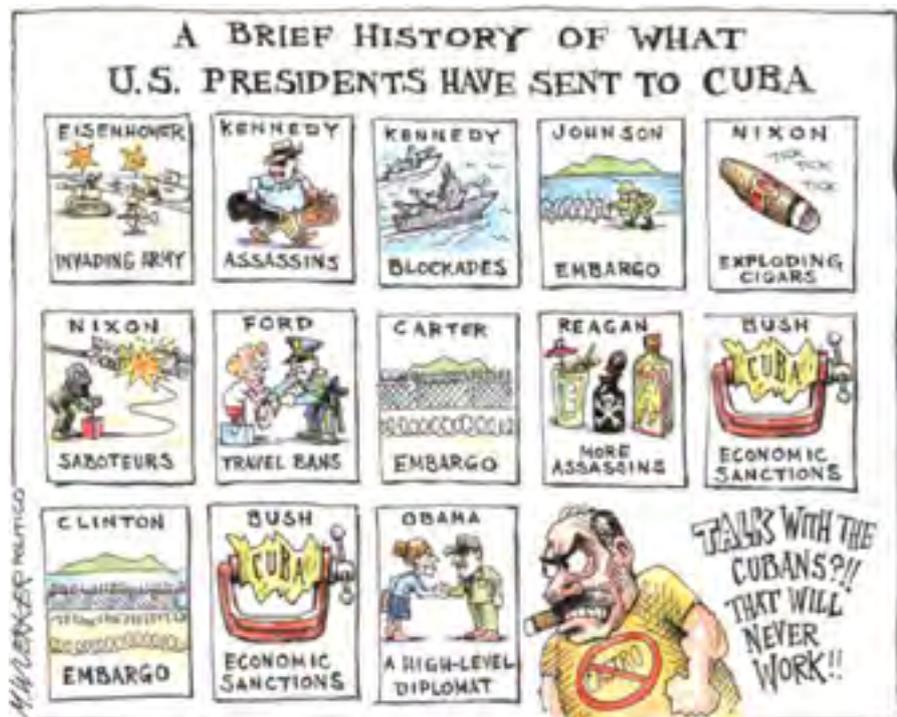
> 美國的利益

美國的政策轉彎不是出於慷慨的好意，而是有更大的一層考量。區域政治已經改變很大了，包括了 ALBA-TCP, Unasur, 和 Celac 的組織的成功，這些沒有一個是包括美國的，這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去沒有一個泛美的組織會忽略給美國席次的。而同時，俄國和中國也已經深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區域了。

傳統的盟友已經向美國表達過不滿了，認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對古巴讓步。去年的聯合國會議上，只有以色列支持禁運。而美國也不可能擺脫古巴。相反的，古巴則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尊敬和感激。古巴贏了，不過和平還沒有完全受到保障。

美國可能會追求其終極目標，去把古巴轉變成為其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盟友。這樣的預測

>>



其實對於現在的執政團隊並不太重要，而且即便是美國的企業在沒有現在的外交政策之下也會找到可以獲利的機會。

不過55年來的齟齬可能不會一下子就煙消雲散。

現在，我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不變的，那就是美國和古巴有 90 英哩的地理距離。■

> 2016 和 2018 的選舉

那麼前景為何？Obama 總統將會在 2016 年卸任，共和黨有可能入主白宮和兩院。其候選人對於古巴政策改變將會減少其程度，認為勢在必行。而民主黨人則有自己的國會鷹派，其總統候選人是新自由主義和「軟實力」的執行者，她說會回到其丈夫當總統的時代的拉美和加勒比海政策，也就是在委內瑞拉 Hugo Chávez 選上總統之前的年代。而要解除封鎖的條件是兩院都有多數的人投票支持才可行。

2018 年的古巴會選出一個新的總統，很可能是現任的副總統 Miguel Díaz-Canel。他將會負責新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他也將宣佈古巴會繼續社會主義的道路，即使市場力量仍會有空間運作，並且新的企業階級將會鞏固其地位。

許多國家希望這個強權和頑固的島國之間的相互和解。這是可能的。新的美國政治方向和古巴的新經濟政策將會支持互惠關係的開展，

來信寄給 Rubén G. Rumbaut <rumbaut@uci.edu>

和 Luis Rumbaut <lucho10@earthlink.net>

> 種族主義和革命

訪談古巴社運人士 Norberto Mesa Carbonell

從1959年開始，古巴的革命就致力於種族平等。這是一個1886年奴隸制度被廢止的國家，而革命也提供了許多古巴黑人土地和教育，這是透過新的平等政策而得以實現，而且目的在於消滅種族歧視。即使有學者說種族民主仍然缺乏，但是就種族平等來說古巴已經做得比其他社會都還要好了。

可是從古巴的「特殊時代」開始，也就是1990年代，資源很有限，市場導向的改革犧牲了平等，並且是和種族主義有相關的。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明顯上升許多，為了對抗這個問題，許多黑人藝術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已經開創了許多很有活力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場域，參加政府舉辦的「區域非裔拉美和加勒比海及古巴分部」(ARAAC)。

在一次ARAAC的會議上，Luisa Steur第一次遇到了Norberto Mesa Carbonell。他是一位60歲的黑人，屈著身向前，眼神充滿政治熱情。以下是在2014年到2015年之間很長的訪談的一部分。Luisa Steur是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學者，在古巴做研究。長版本的訪談可以在Global Express看到：<http://isa-global-dialogue.net/?p=4222>。



| Norberto Mesa Carbonell.

LS：Norberto，你可以談談你自己嗎？

NMC：我在政治上是複雜的。革命的第一個偉大戰役是古巴識字運動(1961)，我那時剛滿10歲，然後開始教其他人唸書和寫字！1963年的時候，當Flora龍捲風橫掃全國，我13歲，加入軍旅，在Orinete選咖啡。5月的時候甚至還沒滿16歲，那時是1966年，剛好友軍事動員！我在那裡，就在等待美國的船上鉤！這是要說我是在革命中長大的。此外，我也讀了很多書。我是工作小組的成員，然後也是黨部的組織小組長。革命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但是1980年代的時

>>

候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我離開了黨。在「Mariel boatlift」期間，許多窮人、黑人離開了古巴，因為活不下去。我們把他們當作背叛者，並向他們丟雞蛋。我發現有一次要離開古巴的人被黨內同志批判，驅逐了，我就想，要是我的兄弟離開上了船，我不會希望他們這樣被對待。所以我退黨了，這是良心問題。

而革命已經達到了許多正面的目標，對黑人來說也是。那是為什麼我繼續跟政府訴求新的事情，請願等等。不像異議分子，我仍然認為政府可以幫我。而且我相信 Fidel 的革命理念，多數黑人都贊同。這是合理的，因為所有的黑人都從革命中有所收穫，但是這不代表我們要永遠感激革命。

所以在 1990 年代的時候，不平等惡化，種族不平等也是，然後我們成立了黑人兄弟陣線 (Cofradía de la Negritud)，對抗種族歧視。我們的主要敵人是對抗被貼上異議分子的標籤。所以我們用社會主義的論述來行動，去批判。我們不想要有種族歧視的社會主義！於是我們的鬥爭要求共產黨去面對古巴的種族問題。只要黨沒有行動，其他組織就動不起來。

LS：古巴的種族主義導致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你有經歷過這些問題嗎？

NMC：黑人組織總是被鎮壓，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黑人比較少有機會去形成正面的認同。你會在 adelantar (前進) 這個字裡面看到這個，這是說要跟白人結婚的意思。這讓人的認同被限制了。要對抗這種問題是很難的，而黑人也在工作和經濟領域都被排擠。

我有一些親身經歷。我在 Marina Hemingway 工作了好幾年，從 1997 年開始，那時有個鄰居是店長，然後我問他是否有工作給我，因為我想要一份工作，而且畢竟我們從同一個社區來的，也一起工作過。那時候我有國際旅館的工作經驗，也會說英文，然後他說：「Noberto，我會幫你啦，但是聽好喔，當你說你想要收銀台或是店裡面工作？那不可能啊，我只會讓你在倉庫工作，因為在 Marina Hemingway 裡，黑人是不能接觸客戶的。」要知道的是，我這個鄰居之前是共產黨的幹部！我因為要工作，只好說「啊，好啊，倉庫啊，沒什麼不可以。」

後來，我聽到他們在找搬運工人，而我只好試著保住職位，不要被選去當搬運工。我們有 5 個人，2 人有靠山，所以這些人是安全的，其他 3 人包括我都是黑人，也都在學英文。但是我們卻最有可能被選去，然後重新接受訓練當搬運工。但是我們都會說英文啊，為什麼要當搬運工！後來我被送去訓練當保全，我記得我剛進入訓練場地的時候，發現他們是把多餘的員工才送來這裡的，而有 60% 是黑人。

後來事情變得更糟，他們解僱我，而且完全非法！我跟工會抱怨，可是沒有任何下文。後來我決定訴訟，爭取法律所保障的勞動平等權益。我去找律師事務所，那裡我被轉介到檢察官辦公室，然後被轉到警察局。我記得我說我要抗議勞動權益被剝奪，而那個人看著我，不理解的說：「勞動權益被剝奪？」我說「是啊，我想要告旅館經理的種族歧視行為！」她很吃驚，然後主管接了案子，開始調查。之後旅館充滿了許多騷動。我後來收到了檢察官的信，說我的案件不符合非法要素，無法起訴任何人，於是無疾而終。

後來 Cubatur 想要僱用導遊，所以我應徵了，我有旅館的工作經驗，然後英文也沒問題！但我去面試的時候，被告知經理不在，改天再來。然後第三天去的時候，在等經理的同時，有兩個白人走進來，討論著我所要應徵的工作。然後經理突然出現了，他居然說公司並不缺人了！

這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我人生大多數時候是一家古巴放牧公司的遺傳學專家，養 Holstein 母牛。一開始，我參加了一場高階管理會議，發現其他人都是白人，我沒想太多。但是現在我會多注意這件事情，因為我看到太多合格的黑人其工作被白人所取代，這也在最後我的最後一份工作時候發生了。那時我是在古巴的一間有名的生物製藥廠工作，他們要取代所有的黑人，包括我，因為我有運動的背景。而我許多的黑人同事離職了，最後我選擇提早退休。

去年，我們的組織寫了一封公開信給 CTC (古巴的中部工會)，要他們去譴責種族主義。但他們有採取任何行動嗎？沒有。我們需要一個政黨去處理這個問題，因為若沒有這樣的開始，公民社會不會關心這個問題的。「建立一個繁榮和永續的社會主義」是個命令。「繁榮和永續」，很好啊，那種族主義呢？所有這些新的經濟改革，吸引外國的投資，增加中小企業等等，這些都是在惡化種族不平等。

LS：有技術、有教育的黑人工人的擔心種族主義的經濟問題嗎？

NMC：種族主義主要的問題還是貧窮問題。許多黑人青年無法上大學，若不能唸書，那麼他們的工作收入不夠養家活口。我們既然有辦法讓數千名的巴基斯坦青年可以唸書，成為醫生，幫他們付學費，但我們卻無法照顧貧窮的古巴青年？這個革命應該是「由弱勢完成，也為了弱勢」，但現在卻只有有錢人可以接受教育？

可要知道，在古巴，有上千畝的土地，雜草叢生，但是人們卻不想務農。同時我們有許多人搬到都市，但是找不到地方住。我的建議是找到黑人家庭，若他們想搬到鄉下，那麼就成立農業社區。當然，他們需要許協助，工具等

>>>



一則對於當今古巴種族主義的評論：「Agua blanca, agua negra,[白水、黑水]」，寫在水塔上，位於 Callejón de Hamel, Central Havana, 這是對於承認古巴黑人的一社區藝術的開始。Luisa Steur 攝影。

而來參加，其實會希望吃點東西。有些時候我們必須要把會議延期，因為我們沒有資源，而且每個人都忙著達到目標。但是至少人們知道我們是真心在做這些事情，而非只是玩票性質。我們會繼續奮鬥，那是一定的。我不想讓我的子孫還要面對相同的問題，或甚至比革命前還要退步。■

來信寄給 Luisa Steur <luisasteur@yahoo.co.uk>
和 Norberto Mesa Carbonell <nmesacarbonell@gmail.com>

等，那為什麼不問 NGO 去在經濟上幫助他們？當然，古巴政府要給他們土地所有權，而這些年土地一直被變賣，所以有何不可？

古巴在 19 世紀的時候，有些農場事實上是屬於自由黑人的，在 Oriente 省特別是如此。許多自由的黑人在獨立戰爭中(對抗西班牙)作戰，離開農場加入解放軍。但是美國的公司把他們的農地買下，因為產權沒有明確標示。而那些黑人怎麼辦？他們準備好要抗議了，要去拿回土地，而許多人也加入了 1912 年的東部省份起義，那是由 Partido Independiente de Color 所領導的。但是許多人後來被殺害了。

所以這今天的這個計畫是關於歷史正義的，若政府把土地給這些人那將是偉大的舉動。而也要給他些真正想要的。這個計畫也是對於黑人來說的一種歷史正義，但是若有些白人想要加入，當然可以！對於黑人來說，這是提昇經濟地位的其中一種方式。

LS：那你這些天是怎麼過的？你有資源去組織 Cofradia 的活動嗎？

NMC：我靠補助金過活，只有一點點錢，所以不容易。我晚上工作，當有錢人的保鏢，這樣一個月可以賺 30 美元。而在只有一點點錢的情況下，其實要組織活動也很難。人們若從很遠

> Havana的新聞頭條¹

by Luisa Steur,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丹麥



在中Havana的垃圾車。Luisa Steur攝影。

2014年12月17日那天，Obama宣佈了美國和古巴將會復交。在Havana，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天。Juan是一位前拳擊手，現在是街道清掃員，他對古巴總統Fidel Castro非常忠誠。Juan那天在他位於中Havana (Centro Havana) 的清潔站辦公室裡，在從垃圾堆中撿來的電視上看到了這則新聞。他看著Raúl Castro的演講，知道了古巴的五人組英雄都被釋放了，心情相當激動。終於，這些年來在古巴的遊行和塗鴉所訴求的事情，如今都實現了。可是晚上的時候，當我看到他回到他的現實生活之中，篩選著垃圾堆撿來賣錢的飲料罐，他和他的同事有了比較現實的討論：那些英雄會接受到過去在牢獄之中的補償嗎。會有車子或

房子嗎？Juan的想法是：沒有任何金錢可以彌補他們在牢獄中所受到的痛苦。而他的同事則沉默以對。

Juan的鄰居，Mari，則在他雇主的平板電視上看著Miami地下電視頻道，報導著一位被古巴軍隊擊落的美國飛行員的女兒講述著其心境。這是古巴五英雄在通報古巴政府美國所謂的「人道介入」或是古巴稱之為恐怖攻擊的時候發生的事情。Mari的雇主有一棟觀光別墅，Mari則是負責打掃的人。她要Mari繼續工作，別分心。「這小女孩啊，」該雇主說，「成天只會幻想著要去墨西哥工作而已，但是她完全不知道資本主義下的工作是怎麼一回事。」當雇主離開

>>

時，Mari 反對，說，「這個老巫婆，我就讓她看看她沒有我的話該怎麼辦！觀光客會來這裡住還不都是因為我的緣故！」她樂觀的認為，之後應該沒有去墨西哥工作的必要了，因為古巴經濟會好轉起來，更多觀光客會來，她的生活會更好。

可是對 Mari 或是 Juan 來說，生活會變得比較好嗎？就像許多其他古巴的人，他們假設變化會是朝好的方向前進的。經濟的開放意味著更多的錢會進來；生活水準會回到 1989 之前的水平，那時候配給卡可以保證拿到足夠的食物，而古巴人那時也有好的健保和教育制度。少數人則認為在 2014 年 12 月 17 日之後，古巴的後社會主義道路開始了，朝著私有化、市場化、國家轉型，甚至不平等的方向邁進。

以 Juan 為例來說，他是一個國家僱用的街道清掃員，賺 800 比索（約 32 美元），這比他的上司還多。但是他的老闆則忙碌的買房子出租給觀光客（每晚 30 美元的租金）。他們也有國際的網絡，也把他們的組織變得更有利可圖，更與市場結合在一起。Juan 的唯一希望就是可以從他的回收垃圾車中多賣一些東西賺得外快，或是他的鄰居會僱用他去清掃。他的配給卡保證了一些基本用品，但是不包括蔬菜或是肉類，也不包括牛奶。在 Havana 的 10 年，他沒有戶籍，若沒有醫生診斷，他得到黑市買消炎藥治療他的潰瘍。他從一些傳言中感到焦慮，因為人們說公有的企業會變成「合作社」，雖然可能會提高工資，但是也可能會裁員。而 Juan 很可能就是會被裁掉的其中一個。

Mari 還至少有個戶籍，也有足夠的錢去支付社會主義的福利開銷，讓其家庭受益。可是作為一個自願員工 (cuentapropista)——一個越來越普及的類別——她一個月只賺 40 美元，沒有保障、福利、退休金。他的雇主也不願註冊她為勞工，所以檢查員都會上門要求賄絡。Mari 的雇主因此把這個賄絡成本歸給 Mari 去負擔，把薪水扣掉，剩下 0 元，所以 Mari 只能靠觀光客小費過活。Mari 和其雇主會爭辯到底是什麼吸引了觀光客前來，而這種協商總是不平等的。即使有

小費，Mari 一週只能賺 25 美元，而她雇主一晚就可以賺 50 美元。Mari 很窮，得面對老年後會窮苦無依靠的下半生。

以上這些故事很不幸地和東歐的經驗相吻合。東歐社會主義終結後，新的「合作社」讓許多員工失業，而前國有企業的管理階層也把組織變成了半私有的財產，並熱情的支持私有化。古巴的都市階級——那些財產持有人，從旅遊和房地產業獲利的人——可能會進一步支持去管制化，並且保障財產、減稅，犧牲工人的利益，然後粉碎社會主義的安全網。

當然，古巴不是東歐。古巴的社會主義具有非常實在的基礎，經過長期醞釀、準備、革命而成，不像是蘇聯的佔領那般由上而下。社會主義和革命在古巴是很本土化的產物，是工人的驕傲，是人民社會主義的崇高特質，代表著中 Havana 的文化。在這個轉變的全球脈絡之中，古巴或許可以開始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後社會主義。而且也可以開始辯論後社會主義道路可能會帶來的風險。■

來信寄給 Luisa Steur <luisasteur@yahoo.co.uk>

註 1：我在 2014 年 9 月和 2015 年 1 月之間在 Havana 做田野，附屬在 Juan Marinello Center for Cultural Research。我要謝謝「國際社會文化人類學研討會」的參加者，我在 2015 年的 1 月 9-12 日籌辦了這個研討會，而參加者包括了來自 IUAES（國際人類學聯合組織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的全球轉變和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委員會成員。文章中提到的工人的姓名是經過變更杜撰的。

> 太陽花運動 和接受重重挑戰的台灣社會學

By何明修, 台灣大學, 台灣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挑戰了社會學的公共角色。

2014年3月18日的晚上，台灣的一群大學生衝進並佔領了立法院，為的是抗議一項台灣政府與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學生佔領運動出乎意料地持續了24天，並且帶給了政府莫大的政治危機。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也被認為啟發了6個月後的在香港的「雨傘革命」。此外，太陽花運動也是在國民黨於2008年之後再次執政之後，規模最大且歷時最長的集體動員行動。運動最終和平落幕，並且成功地讓爭議性的自由貿易協定擱置在立法院。

台灣沒有公民不服從的傳統，而且保守的政治文化讓激進的抗爭行動沒能孕育出來，可是太陽花運動卻得到了廣大的民眾支持，這是由於三個相關的因素所導致。首先，該運動試著去維護民主程序，要求與外國簽訂協定時要公開透明、接受審查。第二，太陽花運動反對的是自由貿易。第三，這個動員也表達了民族主義的抗議，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擴張野心被包裝成「促進兩岸經濟交流」，但

是這個交流只會讓大財團得利，並且犧牲受薪階級、勞工、以及民主價值，所以這個反政府的太陽花運動也有博蘭尼式的社會自我保護成份。

台灣的社會學社群，包括了教授和學生，在這個史無前例的運動中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清華大學、臺北大學、中山大學的社會系回應了太陽花運動領袖所呼籲的罷課號召，不顧學校管理階層和教育部的壓力，在運動期間停止上課。此外，社會學家在立法院外或是校園內對公眾開講，宣揚運動的理念。在一場實驗性的審議民主場合之中，一群老師和學生共同討論了自由貿易和年輕人失業問題等等。此外，許多社會學系所的學生則在立法院內紮營過夜，其中包括了陳為廷(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相當具有群眾魅力的太陽花運動領袖)。而台灣社會學會在3月25日則一致通過發表了支持太陽花運動的聲明。而11月的時候，台灣社會學會以肯定學生運動的立場，邀請了核心的學運領袖魏揚到社會學年會發表專題演說。

>>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對於介入學運與否，台灣的社會學家也有少數不同的聲音。當社會學會的通訊刊出了一篇反對政治參與，堅持「價值中立」的文章同時，也有另一篇討論韋伯這個概念在當代的適用關聯性的文章，強調運動參與並不是違背價值中立。無論如何，重要的是，這種對於社會學的使命和公共角色的辯論充分顯示了這個學科在台灣的健康與活力。

台灣社會學社群的公共參與也招到了保守派的反撲。一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就公開譴責社會學家「沒做什麼事情，只會煽動學生上街頭抗議」，並要求教育部要去徹查公共學校的社會系所。社會學社群也立即做出了回應，包括了許多學生和老師投書到報紙，捍衛社會學的批判精神——這是一個公開宣稱這個學科重要性的難得時機。但許多社會系也接到了許多抗議電話，這也很讓人困擾，因為許多打電話的人拒絕說明自己是誰，並且使用不禮貌的言詞，帶給社會系的員工造成很大困擾。例如，中山大學社會系就收到自稱是學生家長的電話，說停課帶給他女兒很大的麻煩，因為他女兒三個月內就要畢業了(問題是中山大學社會系成立才剛成立不久，那時根本還沒有四年級的學生)。

總體來說，太陽花運動對於台灣社會學的影響是有益的。其戶外授課、審議民主、投書報紙等行動讓社會學的能見度大大提昇許多，越來越多學運參與者開始對社會學感興趣，因為社會學的許多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釋權力如何

在當代社會維繫、執行、以及受到挑戰。例如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申請人數在2015年就增加了一倍，許多報考者以其個人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的經驗作為主要的申請動機。

雖然我們不知道太陽花運動的長期影響為何，但是過去的經驗或許可以作為參考。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是一個成功的民主學生運動，吸引了許多年輕人投入社會學這個領域。許多前學生運動的成員現在都是四、五十歲的專業社會學家。他們的教學和研究也為台灣社會學帶來了公共介入發聲的特色。同樣地，太陽花世代也將會重新形塑我們這個學科。■

來信寄給何明修 <mingshoho@gmail.com>

譯註：感謝原文作者何明修教授給予中文翻譯的指正與建議。惟文中錯誤概由譯者負責。

> 誰先出頭？ 工運還是環境運動？

by 劉華真, 台灣大學, 台灣, 國際社會學會(ISA)勞動與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財務長



福島核災後的台灣反核遊行。2011年4月。

1970年11月13日，南韓的紡織工人全泰壹帶領了10名工人，抗議惡劣的工作環境，他們要求「一天工作9小時，月休4天」。當抗爭接近尾聲，全泰壹引火自焚，高喊「我們不是機器！落實勞動法令！」全泰壹的自焚以及受其啟發的後續抗爭，開啟了南韓民主工會運動，並揭露

軍事政權主導的發展主義之下，深沈的勞資衝突。

全泰壹自焚的4個月之前，95名台灣農民要求污染賠償以及鄰近的食物工廠搬走，因為該工廠把有毒物質排入周邊的灌溉系統，連續兩年導致農作物受損。這起事件和同年發生的64起類似的請願、圍廠、抗爭，代表了第一波台灣反對環境污

染動員的高峰，抗議台灣由發展國家所主導之無限制的工業擴張。

不論是南韓的全泰壹或是台灣農民的抗議，都不是偶發事件，這些抗爭事件拋出以下謎題。相近的殖民歷史、威權統治、和快速工業化，在台韓兩國造成類似的危險工作環境以及環境破壞。但是，兩國的社會運動

>>



在全國勞工抗爭上為兩位自殺的勞工舉行喪禮。2003年11月13日，劉華真攝影。

卻往不同的方向發展。南韓的勞工運動和台灣的環境運動在差不多的時間成形，但是南韓的環境污染和台灣的勞動問題卻晚了十年才引起大眾關注。兩國的結構條件既然相似，為什麼勞工與環境運動發生順序卻是相反的？

答案就在於，在發展國家和企業經濟脈絡下，工運與環境運動所代表的兩種運動實力 (movement power) 得以實現和受到限制的程度，運動實力指的是讓個別運動有能力去影響世界的特質。工運的制衡力 (leverage power) 建立在工人是生產和提供勞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藉由拒絕提供勞務，工人阻礙資本家獲利。與之相對，環境運動則沒有這種制衡力，而是依賴論述能力去說服公眾接受一套新的意識形態（環境主義），基於其推進普世價值和共善的宣稱。

雖然在1980年代的南韓和台灣都是威權統治的國家，但是兩國卻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去處理社會運動的挑戰。南韓政府採用鎮壓的手段，而台灣政府則使用收編的方式。這兩種策略分別阻

礙了南韓環運和台灣工運的展開。但是，南韓工運找到對付鎮壓的方式，而台灣受污染的農民也有回應收編的對策。

當南韓的勞工運動被鎮壓；而其怨懟無法被體制所吸納，工運份子想方設法強化組織基礎並建立工人間的團結感。鎮壓無法阻擋他們對於制衡力的追求。當看似全能的台灣政府無法解決環境公害時，污染受害者和環運人士提高請願的行政層級、採取對抗性的行動、並向任何願意聆聽的人發聲，包括大眾媒體。其結果是環境理念的傳散與理念力 (ideological power) 的累積。諷刺的是，儘管政治脈絡仍能妨礙運動成功，特別是在運動初期，但是特定政治脈絡卻對特定的運動策略有利，南韓工運鞏固了制衡力，而台灣環運發展了理念力，這也因而解釋了這兩個運動為何較早出現。

一旦兩個先行者運動 (early-riser movements) 成為了主要的反對力量，他們也影響了後續在該社會中生產運動實力的方式。南韓工運留下的是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和自我組織能力；台灣的環

運則仰賴現實主義、政治協商與妥協。後進運動—南韓的環運以及台灣的工運—的組織和文化策略，都是對這些「早期範本」的挪用與回應。

這項比較研究也揭露了兩條受運動實力約制、而形成高度反差的運動軌跡。南韓兩國的工運都透過組織策略產業（包括汽車、石化、郵務、造船等）來提昇制衡力；兩國的環境運動也透過公關技巧和吸引媒體版面的策略極大化理念力。

然而，運動實力的極大化有其代價。將工會視為只代表「勞工貴族」讓它失去一般民眾的支持。工會的組織基礎也被工廠外移、削減終身僱用保障、大量使用「無法組織」的移民和臨時工等資方策略所削弱。

於此同時，當環境保護在台灣與韓國都成為公共論述的一部分，新而有力的競爭者也出現了。政府的環保部門、環保諮詢公司、私人智庫的興起，挑戰了環運對於環保論述的壟斷地位。此外，兩國的環運都在對抗企業的戰場上節節敗退，因為其對生態的想像都忽略了窮人和弱勢族群的生存問題。

>>



南韓的全國勞工抗爭。2003年11月13日，劉華真攝影。

面對這些危機，工運與環運都試圖取得新的運動實力，平衡先前實力極大化策略所帶來的限制。因此，工運從廣泛的公共利益的角度來闡釋其關懷，而環運則試圖針對污染企業建立更大的制衡力。

在危機浮現的同時，工運和環運結盟可能性也提高，因為兩者都開始去同理彼此的困境並學習對方所累積的技巧。在本文的兩個案例中，工運長於草根組織但弱於論述生產，而環運則剛好相反。兩個運動都有各自擅長的技能和天賦，彼此可以互補。

本文的跨運動比較標示了工運和環運的互補性。以「運動實力」作為分析概念，重新引導目前對於運動出現、序列、軌跡的討論，

而台灣和南韓的案例也顯示了工運和環運結盟的物質基礎。工運和環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兩者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的社會生活，以及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而這項歷史比較研究，讓學界和運動界重新審視工運和環運的過去和可能有的未來。(註)。

來信寄給劉華真 <hjliu@ntu.edu.tw>

註：更完整的內容可請見 *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2015,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譯註：感謝原文作者劉華真教授給予中文翻譯的指正與建議。惟文中錯誤概由譯者負責。

> 壓縮的親職

by 藍佩嘉, 台灣大學, 台灣, 國際社會學會(ISA)家庭研究委員會(RC06)和勞工運動委員會(RC44)委員



台灣有越來越多的親職教養論述預設了中產階級的核心家庭作為理想模式。這是台灣新北市政府發行的幸福家庭 123 親子手冊。

台灣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底的幾個國家之一。而台灣的父母親時常參考教養專家的意見去養育小孩、關照小朋友的情緒與需要，但是這些建議通常是從西方論述翻譯而來。既然能夠取得更多的文化資源與市場服務，為什麼現在的父母親在養育小孩的時候反而比過去的世代感到壓力更大、更焦慮、且更不確定呢？我的研究試圖去解開這個謎題，使用參與觀察、論述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訪問了超過 50 個家庭，含蓋了各個社經階級背景的父母親。

教養和階級不平等的關係一直是社會學的重要問題。可是既有文獻的問題在於 Andreas Wimmer 和 Nina Glick Schiller 所說的「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學者通常把單一社會中的階級區隔視為一種封閉的分析單位，因此忽略了多個社會彼此相互構成，相互影響的這個事實。

台灣提供了**全球社會學**一個很好的研究場域。全球社會學把地理空間視為知識形成的重要場域，並且把歐洲中心主義的社會學看成只是多種理論觀點的其中一種而已。我以教養作為經驗案例，透過這個案例，我探討全球化如何形塑了微觀的家庭生活和階級不平等。教養的公共論述在戰後的台灣變化很大，小孩的地位也從被看成是服務於軍事和民族主義的勞動身體，轉變成為受到生命政治治理所影響的健康身體。而父母的角色也變了許多。以前的父母親主要是管教小孩的執行者，現在則變成是親職教養建議的接受者。

許多學者認為工業化、都市化、生育率的下降形塑了我們現代對於教養孩和親職的觀點。這種看法隱藏著**現代化**的論調，視西方現代性為普世模型，忽略了全球的文化特殊性和權力的不平等。

其他常見的論述則把對於親職和教養觀點的全球趨同看成是全球資本主義和「麥當勞化」的經驗例證，或是將其歸因給關於兒童發展和早期教育的科學知識之全球傳播的結果。這兩種觀點都有把全球化簡化成外部因素的傾向，忽視了地方社會如何挪用、本土化、混合全球化的元素。

南韓學者 Chang Kyung-Sup 使用了「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 的概念去描繪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快速轉變和壓縮了時空下，文明化進行的過程。多重現代性的多元性，像是傳統、現代、後現代、本土、外國、全球的元素等等，它們彼此共存、相互競爭、相互影響。我則用「壓縮的親職」(compressed parenthood) 去描述在被壓縮現代性脈絡下的變遷、複雜、有時矛盾的親職教養實做。這不僅可以適用於台灣，也適用於位於全球南方的其他個案。

這個概念包括了三個面向。第一，台灣壓縮的經濟與政治發展—包括了快速的工業化和民主化—導致了代間的社會流動和活躍的公民社會。中產階級父母時常抱怨感嘆其過去在貧窮環境和威權政治下所「失落的童年」，並很確定不要用傳統的教養方式，而要給孩子一個快樂和自主的人生。這種受到美國文化極大影響的教養風格甚至成為了一種認同，用來強調父母親的家庭向上流動和世界認同。

然而，台灣的中產階級父母也發展出了不同的對於小孩如何在全球化社會下生活的的未來想像。許多人試圖去「培養全球競爭力」，策略性地把小孩送到英語幼稚園，精英學校，或是美國的夏令營，希望帶給小孩更多的全球文化資本。

另外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家長追求另外一種教養方式：「規劃自然長大」。這種方式以小孩的「自然成長」為優先，把其他過多的介入視為視對兒童有害的。這樣的家長選擇非主流 (alternative) 的教育機構，採用西方教育理念，排除教科書和考試。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壓縮親職的第二個面向。雖然這些教養的文化腳本反應了全球化的影響，但是也和台灣的現實環境有所衝突。例如，家長常常被建議要去花很多的時間和小孩溝通和互動，但是台灣多數的工作環境對於有小孩的家庭並不友善。雙薪家庭相當依賴課後輔導或是親戚去照顧小孩。儘管這些父母有著「代間斷裂」的論述，但是還是要仰賴小朋友的祖父母的幫忙去養育小孩。

另外，父母親也要面對親職價值和制度環境之間明顯的落差。儘管家長擁抱快樂童年的

教育理念，但是他們也還是會擔心小孩在這些高度競爭與升學主義環境下的生存能力。他們會擔心其外向、有主見的小孩是否能夠在未來適應得來，因為他們也曉得台灣的多數企業還是存在著集體主義的文化和階層化的權威主義。

最後，被壓縮的親職有著不同的階級版本，不同階級的父母所受到的全球化和壓縮現代性的影響並不相等。全球化提供了更多機會和資源給有足夠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家庭，但是也邊緣化了那些低社經背景的家庭。

台灣在最近幾十年的資本外流和勞動力輸入對於工人階級的男性的影響特別大。許多這些人若在台灣找不到另一半，就會轉向東南亞或是中國，組成一種全球化的家庭。此外，新的親職教養腳本—特別是禁止體罰和對於家長參與學校課業的期待的增加—預設了家長時間的彈性和溝通的能力。因此，工人階級的父母、新移民、以及其他弱勢的父母漸漸被視為是「高風險家庭」。

時空壓縮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親職教養在台灣變成了情感回饋的寶貴體驗，卻也充斥困難與挑戰的複雜實作。從全球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西方文獻傾向把親職論述的轉變化約成一種內生的過程，忽略了家庭的文化和歷史建構。所以，我們需要研究全球化的脈絡如何形塑了各種資本積累所影響的教養策略，以及其如何影響了不同階級和國家的小孩之不平等的童年。■

來信寄給藍佩嘉 <pclan@ntu.edu.tw>

譯註：感謝原文作者藍佩嘉教授給予中文翻譯的指正與建議。惟文中錯誤概由譯者負責。

> 從奇蹟到崩壞

21世紀的台灣社會

by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 台灣, 國際社會學會(ISA)社會階層化委員會(RC28)和災難社會學委員會(RC39)會員

過 去三十年來台灣歷經了巨大的經濟、政治、社會變遷。但是關於台灣的社會學文獻仍聚焦在台灣做為發展的成功案例，這些解釋通常包括了以下幾點：

- 一個強大且理性的「發展型國家」，由國民黨的威權科技官僚所掌控，由挑選獲勝企業給予補助而達成產業升級；
- 一個活躍的出口導向（全球化）經濟模式，以成功的土地改革為起點，加上由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 高比例的向上社會流動，原因是富創業

精神的小型企業主，以及產業勞動力當中擴張的新中產階級比例增加。

這些經典論述也非總是報喜不報憂，其也承認台灣是一個受到傳統儒家文化影響，在包括家庭、教育、勞動力市場等領域都存在著性別歧視的社會。最後，這種論述是以溫和中產階級所主導的和平民主轉型作為快樂結局（見下表）。

然而從 2007 年開始，被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大蕭條已經挑戰「台灣奇蹟」的解釋。當國民黨於 2008 年重新執政後，科技官僚把政治混

台灣發展的典範變遷

	「奇蹟」典範	「崩壞」典範
國家	威權、自主、發展型國家	貪婪腐敗，到民主化之前都沒有課責性
經濟	本土的私人中小企業所主導的出口導向經濟	中小企業沒落、壟斷資本外移中國，剝削中國農民工
社會階層化與流動	中小企業精神，中產階級興起、高度社會流動性、低失業率	去工業化、階級不平等、階級再製而非階級流動、青年失業率高
性別、家庭、人口	儒家父權文化、教育和勞動力市場裡的性別歧視、早婚、低離婚率、成功的生育控制	性別不平等減少、家庭解組、離婚率與美國同高、超低生育率、人口快速老化
政治變遷與政治分歧	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對抗本土公民社會；族群和國家認同的分歧	民主價值的興起、階級意識抬頭、世代正義觀出現、太陽花運動反對中國效應

亂歸咎給民主體制和民進黨政府的台獨政策方向。而國民黨政府則追求更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政策，強調與中國的貿易拓展。從 2014 年 3 月起，因為大眾對於「中國效應」的擔憂，而形成了自 1990 年以來最大的學生運動，人們開始辯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和國民黨和大企業的結盟而忽略本土中小企業等等議題，這些都挑戰了「奇蹟典範」的論述。

近來的研究則批評了台灣的「發展國家」，認為保守和腐敗的政治結盟造就了國民黨的威權政體，排除了中小企業和台灣人的政治參與。這些研究和批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中共黨國的「韌性威權主義」的論述類似。重新檢視台灣的經驗，對於經濟成長和威權國家之間同時發展的關聯，我們認為較好的解釋是經濟成長滋養了威權主義，而非後者幫助了前者，而福利國家和公民身份等發展，則是在民主化之後才成為政治議題。

由於從 90 年代開始台灣大企業就大量投資中國，台灣的產業結構已經產生的巨大變化。中小企業的出口產值從 76% 降到 18%。現在有 82% 的出口來自於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已經被跨國資本所取代。例如，台灣大企業 2013 年的總營收，像是鴻海（富士康）集團，佔了 21% 的台灣 GDP。而富士康的勞動衝突也指出，台資其實得利於剝削中國農民工和中共黨國威權主義的土地徵收。

台灣的產業結構變遷也重塑了社會階層。90 年代的都市中產階級，是由中小企業主和技術勞工所形成，造就高度社會流動。當經濟成長趨緩，則財富與所得不均惡化，階級流動也減少。就像其他的後工業社會，台灣社會的職業保障弱化，非典型職位與工作貧窮人口也增加。

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性別不平等的減少。教育和所得的性別不均下降了，而且是東亞國家裡面最低的。可是勞動市場上和家庭內的歧視，可能沒什麼太大的改善。有趣的是，有研究認為婚姻可能讓台灣女性更不快樂。事實上，台灣的女性就業人口是傾向不婚和不懷孕的，為的是保住職業生涯、自主、收入。這導致了低結婚率，以及跟美國一樣的高離婚率，還有超低生育率。

經濟和社會的變遷重塑了台灣的政治景觀。政治學的文獻通常聚焦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和本土公民社會之間的衝突。但是 90 年代以來的民主化、經濟不平等、世代不正義的出現，也導致了新的政治分歧。有些選舉研究認為，民進黨的支持者主要來自藍領階級和農民（男性為主）還有年輕具自由派價值的世代。

從 2008 年開始，國民黨政府就採取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來刺激台灣經濟成長的策略。在國民黨的威權主義懷舊心態驅使之下，政府一直推動這個新自由主義的「下滲經濟學」意識形態。為了批判中國與台灣透過自由貿易而達成經濟與政治整合，吳介民提出了「威權資本主義的跨海峽政商聯盟」之說。這個政策方向也讓台灣長期以來的國家認同、階級、世代的分歧更加擴大。

台灣的轉型常被誤認為是成功發展的模型。台灣的中小企業被認為是成長的源頭，但如今正在衰退中。大企業和國民黨科技官僚的權力，主要依賴於強大的國家能力，現在卻推動和中國的自由開放貿易而自毀其能力。台灣年輕人必須面對失業，向下流動，就業沒保障，薪資停滯，稅收和社會保險費的提高。我在一本書中提出，社會變遷已經帶來階級不平等的惡化與嚴重的世代衝突（註），該書非預期地成為社會學暢銷著作、甚至被認為是太陽花運動的靈感來源之一。有別於過往的經濟奇蹟典範，一些年輕學者主張台灣社會學的典範轉移，認為研究應該多聚焦在未來可能的社會崩解。

來信寄給林宗弘 <zoo42@gate.sinica.edu.tw>

註：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譯註：感謝原文作者林宗弘教授給予中文翻譯的指正與建議。惟文中錯誤概由譯者負責。

> 台灣社會學的 普遍性和特殊性

by 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 台灣, 國際社會學會(ISA)種族、民族主義、族群關係研究委員會 (RC05)委員

要 整體描述台灣社會學的現狀其實不太可能，但是我可以提供幾個例子去說明台灣的社會學家是怎麼「做社會學」的。讓我從最近的一次台灣社會學 (TSA) 年會 (2014 年 11 月) 說起。過去的 20 年來，社會學年會已經是台灣社會學社群最重要的活動了。現在的會員約有 500 多人。2014 年的會議在國立清華大學舉行，有 64 個場次和 180 篇的論文發表，含蓋了從政治經濟學到後現代主體性的各種包羅萬象的主題，還有討論東亞議題和中國轉型的場次。出席的貴賓也邀請到了包括了日本社會學會和韓國社會學會的學者，還有香港來的中國學者。

這次年會其中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無非是開幕演講了。和以往不同的是，擔綱這個演講的人是一位年輕的研究生，叫做魏陽。他的演講談的是他的運動經驗，以及對於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的反思 (見這期何明修的文章)。這個有別於傳統的開幕演講正代表了台灣社會學的特色。台灣的社會學家總是挑戰既有的典範，辯論像是不平等、民主、正義、公民身份等的議題。

不過，也就像其他地方一樣的是，台灣社會學會的成員也有著不同的社會和政治立場，對於社會學的想像和實踐有著不同的主張。在年會的走廊上，我們會聽到有成員公開地表示反對學會對於社會運動的背書。有些人擔心學會的政治化可能會拉低學會的專業水準，並且有害於學會作為一個學術組織的角色。台灣社會學一直都有在辯論這種有關介入社會的立場與方式的議題，這也是這個學科自從創立一開始就有的傳統。

台灣社會學的其他活動也很重要。例如學會每半年出版一期同儕審查的專業期刊：《臺灣社會學刊》。另外也發行三期通訊，和一個

廣受歡迎的部落格：巷仔口社會學 (見這期王宏仁的文章)。這個部落格是一個相當方便傳遞學術知識和辯論時事的場域。

台灣社會學會的會員和其他的學術組織有所重疊，像是台灣女性學學會、文化研究學會、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台灣 STS 學會等等。這些與相近領域的延伸重疊關係為社會學和更廣大的社會科學社群注入了一股充沛的活力。

為了讓大家了解台灣社會學家的興趣所在，以下我要介紹過去 10 年來學會出版的三部著作，每一本著作都代表了不同的風格：(1) 傳統或是「主流」，(2)「跨國」或是全球，以及 (3)「公共」。這個選擇或許有所侷限，但是每一本都廣受接受，而且很具有代表性。

《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主編，2013) 代表了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主流的台灣社會學代表。書中的文章檢視了台灣的政治參與和大眾傳播在民主時代的變化。這些研究都是以分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TSCS)(從 1989 年開始) 所收集的全國性樣本資料為基礎的文章。該調查提供了共時的「快照」圖像，讓研究者可以比較歷時的變遷，像是公民身份，國族認同，宗教，性別、家庭、就業、全球化等其他主流社會學的議題。從 2002 年開始這個調查計畫也納入了國際社會調查計畫 (ISSP) 和東亞社會調查 (EASS)。資料都向全世界公開，非常有助於比較研究。

《流轉跨界：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國》(王宏仁和郭佩宜主編，2009) 代表了台灣社會學的「跨國」特色。這本書中，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等建議當代社會的高流動性和

「今天的台灣社會學已經有機地鑲嵌在社會裡了。」

快速的全球化讓我們必須要跨越「民族國家」以外去看問題。這本編著也代表了從台灣的角度去研究跨社會和地理疆界的人、文化、資本的流動的知識成果。同時這本書也挑戰了既有對於社會的邊界假設。主題則包括了東南亞的女性家務勞工，台灣佛教組織的全球拓展，移民婚姻的認同和性別議題，以及被夾在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台商和女性。

台灣社會學的公共性則體現在最近的出版品：《巷仔口社會學》(王宏仁主編，2015)。這本書包括了由37位作者撰寫的34篇文章，都是用平實的庶民語言所寫成的短文，目的是解釋社會學的研究發現與理論給公眾知道。這些短文由5個主題串連起來，分別是政治人生、性别人生、勞碌人生、邊緣人生、另類人生。所有的文章都是先出現在同名的部落格上面的(見本期王宏仁的文章)。其臉書網頁在2014年2月開設，在短短一個月就有3000名訪客前來。2014年的每篇文章都平均有6700個點閱次數，遠遠超過其同期的其他網站論壇。雖然文章都在網上看得到，可是該書的銷售量還是創下了台灣社會科學書籍的歷史紀錄。

過去有批評者指出台灣的社會學缺乏特色，而且太過於依賴西方社會學。若是在20年前，我同意。但是後來的社會學家已經面對了許多挑戰，像是威權政府的收編，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質疑，面對西方的社會學本土化辯論，以及中國中心和台灣中心的典範鬥爭。今天的台灣社會學已經有機地鑲嵌在社會裡了，其生產關於公眾相關的知識給公眾。而且許多核心的概念，像是階級、階級流動與複製、國

家、宰制、權利、社會運動、性別、公民社會、公民身份、全球化等等，都已經整合到高中教材裡面，而且成為大眾媒體的語言了。

不過，雖然台灣社會學在很多方面相當成功，但是新的挑戰還是不斷出現。其中一個是人口老化和大學生數量的減少。另外還有市場基本教義派和全球競爭的影響，使得社會學家和社會學的系所都受到管理階層的壓力，要去標準化研究的評量方式，這種方式的邏輯是要取消提供更多資源給那些看來沒有生產力和沒有效用的社會或人文學科。此外，這些挑戰也都在這個不平等惡化的時代同時產生。不過這些挑戰也不是只有台灣社會學才得面對，所以全球的社會學家要比肩共同迎向未來。■

來信寄給張茂桂 <etpower@gmail.com>

譯註：感謝原文作者張茂桂教授給予中文翻譯的指正與建議。惟文中錯誤概由譯者負責。

> 巷仔口社會學

by 王宏仁, 中山大學, 高雄, 台灣, 國際社會學會(ISA)遷移研究委員會委員(RC31)



Arbu繪。

在台灣的學術環境體制之下，要科普傳播專業知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為大學的管理階層不鼓勵這種「不具生產力」的事情，而若有社會科學家想要參與公共事務的話，還可能會被貼上「不夠學術」的標籤。雖然有些學者有自己的部落格，但是通常維持不久，因為經營一個部落格非常花時間。

2009 年底，有一群人類學者開始嘗試經營一個科普共筆部落格，叫做「[芭樂人類學](#)」。這個部落格每週提供一則人類學研究的短評，想要讓更多人可以接觸到人類學知識。雖然芭樂人類學在一開始的幾年沒有受到太多人的注意，可是卻成為了社會學家效法的典範。

2012 年 11 月，台灣社會學家開始籌設「[巷仔口社會學](#)」，並於 2013 年 2 月開始與大眾見面。在一開始的頭兩年裡面，就刊登超過 130 篇文章，由超過 100 位台灣社會學家所共筆而成。兩年內超過兩百二十多萬人點閱，而且許多的文章還由不同的大眾媒體報導過。

在巷仔口社會學成立以前，台灣也有許多科普部落格，像是 PanSci 泛科學 (<http://pansci.asia/>)，或是地圖會說話 (<http://mapstalk.blogspot.tw/>)，幾年內這些部落格就有數百萬的點閱次數。很明顯地，現在人們若要吸收新資訊，他們就會上網搜尋。如此一來，若是社會學家想要影響公共意見或是社會政策，那他們也要上網辯論才行。此外也有很多人已經失去耐心去閱讀長文章了。一位出版界人士曾說，一篇可以在 3-5 分鐘內讀完的網路文章是最理想的文章長度。所以一開始巷仔口社會學的作者都被建議寫 5000 字以內的中文，約 1500 字英文。這長度或許對於報紙的民言論壇投書來說有點太長，但是對於公共的部落格來說則剛剛好。

巷仔口社會學的成功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那就是它受到台灣的整個社會學社群很大的支持。日本社會學會有超過 3000 名會員，而韓國社會學會有超過 1000 名會員。可是台灣只有不到 300 名的社會學家而已。韓國社會學

>>

會的次級研究委員會透過撰寫教科書的不同章節主題，像是移民或是社會理論，去傳播社會學知識。而日本也採取類似的作法，出版了許多社會學講座，處理重要的議題。不過這樣的方式，對於相對小的台灣社會學而言，並不太可行的。所以不同主題、小篇幅的評論，對台灣社會學來說，是比較有效的知識傳播方式。台灣的社會學因為社群小，大家都彼此熟識，所以許多人都很願意大概每兩年貢獻一篇短文給巷仔口社會學。

而過去幾年大眾對於社會和政治議題興趣的提高，也是巷仔口社會學受到廣泛矚目的原因。像是對於經濟全球化的不滿，中國的擴張，或是 2014 年 3 月的學生運動等，都是熱門的議題。在那場為期 50 多天的學生運動期間，巷仔口社會學刊登了超過 17 篇的文章支持運動，而每天也有超過萬人的點閱頻率，在那之前的幾個月則只有 1 千 7 百人點閱而已。巷仔口社會學因此讓運動支持者可以在網路上辯論公共政策，甚至政府官員也來為政策辯護。

巷仔口社會學也是那些對社會學或是社會政治議題有興趣的人的一扇窗，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巷仔口社會學在變得廣為人知之後，越來越多的高中學生透過這個部落格來了解這門學科。這很重要，因為在台灣，社會學總是被大眾認為和社會工作一樣。此外，其他的台灣媒體也會報導部落格上的文章，讓學術知識有了更大的能見度。還有，這些文章也被中國

或香港的網站轉載。當然，不太意外的是，中國網站通常只挑那些無關政治的文章轉載，像是藝術社會學、觀光、社區發展等等。相反的，香港網站對政治議題比較有興趣，像是國家、兒童，或是和香港、台灣、中國等有關的議題。

根據統計，許多學術論文沒有超過 10 個人閱讀過，而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社會科學論文從來沒人讀。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寫的論文但卻沒人念，甚至我們的同儕也不太讀的話，那會很讓人氣餒。但是，巷仔口社會學的成功告訴了我們，其實學術知識是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的。而且巷仔口社會學也讓我們認識到，社會學家可以在不犧牲學術研究的前提之下，可以積極主動地介入公共事務。■

來信寄給王宏仁 <hongren63@gmail.com>

譯註：感謝原文作者王宏仁教授給予中文翻譯的指正與建議。惟文中錯誤概由譯者負責。

> Jürgen Hartmann

致力獻身的國際主義者

by Lyudmila Nurse, Oxford XXI Think-Tank的共同創始人和總裁,前ISA青年研究委員會(RC34)理事會成員, 英國；Sylvia Tmka, 前RC34理事會成員, 奧地利



Jürgen Hartmann是ISA青年研究委員會會長(1986-1990)和ISA財務副會長(1994-1998)，於2015年3月2日過世。

Jürgen Hartmann 總是開心、友善、仁慈、心胸寬大、正向、合作、助人、溫暖、善體人意。他是一位國際的學者和運動者，也是卓越的組織者，總是能啟發許多人。以上這些都是 Jürgen Hartmann 的友人和同事所描述的。他在 2015 年 3 月 2 日離開人世。

Jürgen 於 1944 年 3 月 18 日出生於德國的 Remscheid-Lennep。他的父親在戰爭中不

幸死亡，所以是由母親扶養長大。Jürgen 小的時候花了很多時間在書店裡面逗留，對閱讀相當渴望，所以很快的就和書店老闆混熟，於是老闆特別讓他可以在書店後的小房間免費閱讀書籍。Jürgen 如海綿一樣吸收了所有他可以吸收的知識，閱讀不同國家的文化、研究地圖、甚至是火車時刻表。這個經驗點燃了他的學術熱情和對環遊世界的嚮往。他閱讀的速度飛快無比，而且

>>

無論他在什麼地方，總是能夠找到方向，就像一個活的指南針。作為一個勞工階級母親的孩子，Jürgen 也很早就學到了烹飪的技巧。

Jürgen 於 1969 年在 University of Cologne 拿到了經濟學碩士。在學期間，他在 Stockholm 找了一份暑期工作，並且得到了 Uppsala University 的獎學金。在那裡他碰見了他後來的瑞典籍妻子 Solveig。1973 年，他於瑞典得到了博士學位，論文是關於學生運動。畢業後一直到 1993 年的這段期間，他在 Uppsala University 的社會系任教，並於瑞典全國授課。從 1980 到 1982 年，他到 Vienna 工作，任職歐洲社會福利訓練研究中心的執行長，這是一個聯合國的組織。而從 1983 到 1986 年，他執行了一份稱為整合年輕人到社會的國際的計畫。從此 Jürgen 展開了國際的學術生涯。

Jürgen 和 ISA 的緣份可以回溯到第九屆的 ISA 世界大會。該屆大會在 1978 年 7 月於 Uppsala 舉辦。執行秘書 Izabela Barlinska 那時還只是位年輕的學生，幫忙籌辦大會。她回憶到，她在諮詢櫃台遇到了 Jürgen，那時是一位從 Uppsala University 來的年輕教授。而這位年輕教授認為自己需要以在地學術社群代表的身份提供幫忙。而他是對的！他們都沒什麼經驗，但是都很樂意幫助其他人，後來他們變成了好朋友。

和世界各地的學者合作對於 Jürgen 來說非常重要。他加入了 ISA 的青年研究委員會 (RC34)，並且成為出納委員會 (1982-86)，後來於 1986 年選上委員會會長。下一任會長 Petar-Emil Mitev 說道：「在冷戰期間，Jürgen 對於 RC34 有著很大的貢獻，他搭建了東歐和西方之間研究合作的橋樑。東歐的青年研究總是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幫忙，奮力達

成目標。」

「Jürgen 對於 RC34 的領導，讓他有了很好的位置去觀察由蘇聯 Glasnost 和 Perestroika 政策所影響的青年的處境和變化。」John Bynner 這麼說。他非常尊崇 Jürgen 的分析觀點，和其合作過歐洲青年和新科技計畫 (1987-1990)。這計畫是由位於 Vienna 的歐洲社會科學研究與檔案中心所執行，並由 RC34 贊助。這個計畫有個特別的價值，就是影響了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的解體。Bynner 描述 Jürgen 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願意把像我這種一開始不是很突出的學者帶進去其研究社群，並擺脫民族立場的狹隘觀點，然後真正相對化文化預設的差異，還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優先順序，特別是在東歐，因為非軍隊的和消費的資訊科技興趣並不普及。年輕人由於對於資訊科技的高度需求和括國媒體的可取得性，成為了社會變遷的主要預言者。若要批評 Jürgen 認為的普及的電腦能力證照是東歐當時的烏托邦想像，那是很難說得通的。他指出了成年期間科技如何重要地改變了年輕人，像是個體化、分化、不平等的加深等等，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社會中持續看到這些現象。我們今日都還在為相關的青年政策搏鬥著，在很大的程度上，這些都是 Jürgen 的貢獻。」

Jürgen 是一位真正的國際學者，因為他開啟了和中國年輕學者的交流合作，在 RC34 的組織下一起研究。而在他擔任該委員會的會長接下來的兩任其中，亞洲的副會長都來自中國，這其實並非巧合。Jürgen 也促成了 RC34 在中國第一次的會議：「亞洲的現代化和青年」(1993 年於上海)。

Jürgen 也很擅長於人際關係。北歐青年研究協調員 (1998-2004) 和 RC34 的會長 (2002-2006) Helena Helve 認為 Jürgen 是北歐青年研究的先

驅。Helena 「對於 Jürgen 於 1960 和 1970 年代的青年運動所做出的傑出的主題演講，印象非常深刻。他也是北歐青年研究論壇 (NYRIS) 的創始者。而他成為有名的國際學者之後，還是依然認為自己是北歐學者。其研究已經被國際化，並且讓北歐研究知名於全球。」Jürgen 也是歐洲青年研究社協力社群 (CYRCE) 的成員，成立於 1990 年，由其後繼者 Sibylle Hübner-Funk 所建立，目的在於強化和結合歐洲的青年研究。

Jürgen 廣博的知識、教學經驗、以及解釋複雜問題的能力任讓他成為一個邀約不斷的演講者。他的演講簡報有個特色，那就是當他對一大群人演講時，觀眾會覺得他是在跟每一個在場的人講話。

Jürgen 在 RC34 的會長一職卸任之後，選上了 ISA 的執行委員。1990-1994 年他擔任財務委員，1994-1998 擔任財務副會長。他的角色幫助了 ISA 的世界大會舉行，並把社會學帶到了 Bielefeld (1994)，Montreal (1998)，和 Brisbane (2002)。

除了青年研究之外，Jürgen 也對於透過經驗去增進國際對於研究的理解相當有熱情。他視青年旅行 (從交換到旅遊) 為核心。Lyudmila Nurse 生動地回憶，在 1992 年 10 月，當她組織之一場「青年與社會變遷：整合或分離」的會議的時候，有一見事情讓她印象深刻：會議的第一天，青年研究院的院長街到了一通電話，是由蘇聯科技部打來的，他們想要和西方的與會學者見面。Jürgen 對於會議引起了俄國政府高度的興趣感到非常熱忱。我們也很高興被邀請到 Kremlin 去，我們的團隊被 Gennady Burbulis 所接待，他是當時的蘇聯秘書長，被認為是除了總統 Boris Yeltsin 之下最有權力的人物。在會議中，主要焦點是如何讓俄

>>

國年輕人可以結合到民主制度之中。Jürgen 是第一個用非常簡單明白的語言回應的人：俄國年輕人必須可以自由的出國。一開始大家都認為這很簡單，沒有問題。不過 Jürgen 繼續解釋說，國家必須改變，並且讓青年願意回來。接著的討論都大大接受了 Jürgen 的觀點。

Jürgen 的青年移動性和旅行的研究對於該領域有著很大的影響。他系統性地分析了旅行的原因和歸納旅行者的特徵。其對於西歐的青年移動和旅行的研究中，他把歐盟的政策和「青年移動」的概念連結到歐洲意識的興起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的整合。例如，他認為，歐洲內部鐵路讓瑞典的年輕人作為「歐洲人」的經驗成為可能，並且超越了制度化的交換計畫。而青年對於旅行的意願也和他們的語言能力有關。

當 Dalarna University 和其他歐洲大學合作成立一個研

究單位在歐洲旅遊管理 (ETM) 的時候，Jürgen 抓住了機會，發展出了旅遊觀光研究的專業，成為了這個組織在瑞典的碩士班的主任。他喜愛教學，一直到退休都是如此。

Jürgen 是 RC34 所有人的好朋友。我們會想念他的團隊精神，開朗的笑容和擁抱，真心的笑聲，以及求知的熱忱，有智慧的建言，以及溫暖的鼓勵。我們會在他留給我們的知識遺產上繼續努力，而他也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來信寄給 Sylvia Trnka

<sylvia.trnka@aon.at>

和 Lyudmila Nurse

<lyudmilanurse@oxford-xxi.org>

註 1：我們很感謝 Izabela Barlinska, John Bynner, Helensa Helve, 和 Petar-Emil Mitev 的協助。